

1. 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在亚洲金融危机、洪水等外部因素冲击下,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 1998 年 8% 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化。

1997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内需求不足、世界经济可能发生衰退的背景下,我们应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大国优势,积极扩大国内需求。

跳出 8% 看 8%： 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率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 1998 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 7.2%，第二季度约为 6.8%，上半年平均为 7%。如果 1998 年要实现年初预定的 8% 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下半年就必须达到 9% 的经济增长率。今年是否能实现 8% 的经济增长率已成为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之一。最近我到青岛市调查时发现，经济增长率目标已“层层放大”：山东省提出今年要实现 9%—10% 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青岛市提出确保 11%—12% 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下属县市又提出 13%—14% 的目标。实现经济增长率 8% 的目标，现在已经成为政府的“政治许诺”。当前，从我们所处的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大历史关头看，确保 8% 是必要的。但我想，如果跳出仅就 8% 而谈 8% 的思路来讲如何正确看待经济增长率，或许更有意义。这不是一个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经济发展目标理论探讨与现实问题。

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是否能够实现 8%，作者所讨论的是实现 8% 增长率到底为了什么。

一、新的发展观：从追求 GDP 到追求人类发展目标

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目的还是手段？我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什么是发展的目的呢？现在国际上最新的发展观已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人类发展。1990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发表了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发展概念以及测量人类发展程度的指标。到目前为止已发表了 8 份《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人民发展的机会，提高人民的能力。机会包括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获得就业的机会，也包括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能力则指就业竞争的能力，提高自身收入水平的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包括民主参与的能力。所以说，发展是一个相对广泛的、需要协调和平衡各种不同目标的目标集，人文发展的概念并不是仅仅追求 GDP 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实现人类发展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增长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人类为增长服务。这是目前联合国每年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所阐述的一个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发展观。1987年世界环境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它正式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于1995年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从以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今天提出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新的发展观标志着人类在发展观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经济增长作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增长和发展的含义相差较大，前者以物为中心，而后者

以人为中心。强调 8% 的经济增长率是十分必要的，但容易形成了 8% 而 8% 的局面。

二、增长效应：水平效应与速度效应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两种不同的效应。第一种我们称之为“水平效应”，是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增长水平就会提高。第二种我们称之为“速度效应”，就是说如果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便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区别在于水平效应是短期效应，只对短期增长起作用，速度效应则是长期效应，对长期增长起决定作用。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来说，起根本作用的是速度效应。根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观点，影响和决定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主要因素是：物资资本的高投资率；人口的技能和教育水平的迅速改进；开放和与其他经济成功的互相作用，以便在比较优势范围中得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增进吸引外国技术的能力；愿意承受和鼓励结构改变，愿意实施制度变革。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根本含义不是要简单地加大投资力度，而是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快技术进步。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效应是不同的。将 GDP 增长曲线分解为趋势分量和循环分量计算，在 70 年代，GDP 增长趋势大约是 5.5%，80 年代上升为 9.5%，90 年代上半期是 10.9% 也就是说，通过多次的连续的结构调整和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与扩散，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效应在不断提高。1997 年世界银行的《2020 年中国》报告表明，1978—1995 年，我国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率居世界首位。这说明我国

通过结构调整而获得的长期性的增长效应明显提高。所以说我们不必过分介意今年或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多高，而应更加关注影响长期性发展的速度效应。当然，从短期来看，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是必要的。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就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目前提出淡化 8% 是必要的。我们只有坚持进行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为下个世纪初期的长期高速度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估计，今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趋势为年增长 8%—9%，低于 90 年代上半期增长速度。这是因为经济总量基数变大；国内制造品市场已出现供大于求的格局，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势头有所减弱；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不断上升；国内投资率已属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列，很难再进一步提高；出口依赖度（指出口额占 GDP 比重）上升速度明显减慢，带动 GDP 增长的能力（指贡献率）不大可能进一步提高。长期增长趋势有所下降，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率。但中国仍属于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三、横向国际比较：再看中国经济增长实绩

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并不只是参照以往的历史记录，更重要的是要作经济发展的横向国际比较。中国的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出口额占了全国 GDP 的 25%，加上进口额占了 40% 左右。国际经济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国际贸易增长，包括非贸易服务增长如旅游收入增长等。从 1997 年 7 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已发展为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称之为外部冲击。在这种外部冲击影响下，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不同，东南亚和

东亚 11 个国家和地区中，目前只有中国和中国香港汇率没有贬值。此外，今年只有中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率可能保持正值，其他国家均出现了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参照系就不能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记录了，而应放在同一个外部冲击条件下，与其他国家作比较。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增长率下调到 2.5% 到 4%，台湾地区也已下调到 5% 到 6%。在这种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 6% 到 7%，已经是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最好的表现了。正像法国总理经济顾问对我所讲的，中国是亚洲地区唯一经济繁荣的“孤岛”。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实现 8%，则更好。

需要指出的是，1998 年 6、7 月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和部分北方地区出现大面积的洪涝灾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新的外部冲击，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GDP 增长率现在还很难估计，因此，即使没有实现 8% 的经济增长率，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不可预见、不可控制的外部冲击来临时，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 8% 经济增长率。适时调整经济增长指标是各国政府的正常做法，不应赋予这一问题政治色彩。适时作出调整是必要的，只要把客观情况讲清楚，人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谁都不是“魔术师”，做不到“点石成金”。经济与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不对称性，决定我们不得不采用“试错法”，作出灵活的调整。

四、新旧周期交汇点：我国正在进入新的增长扩张期

今年经济增长率既是旧周期的低谷点，又是新周期的起始点，即使经济增长率低一点也是正常的，不属于经济发展大落类型，也没有出现经济衰退迹象。改革以来我国经历了四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从 1991 年开始进入第四次经济周期扩张期，1994 年以后进入收缩期，持续了四年，本应从去年下半年进入第五个周期的扩张期，但由于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使得进入扩张期的时间有所滞后。我们认为，从 1998 年下半年进入新一轮经济扩张期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可能性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系统增加信贷、刺激国内需求增加的政策不断出台等各方面。就经济周期而言，中国可能进入新的扩张期。虽然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deflation），如物价上涨率为负值，上半年为 -2.1% ，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出现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率仍保持正值，且处于旧周期结束新周期开始的交汇点上。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低一点，下半年会高一点；今年经济增长率低一点，明年经济增长率会高一点。8%只不过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点而已，而经济增长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如何使这一过程保持持续、稳定、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五、新经济成分：增长的重要来源

增长不但是平衡的过程，也是结构变动的过程，表现为新经济成分在迅速增长，旧的经济成分在相对衰落。实现 8% 的经济增长率仅反映了全国各地区或各部门经济增长的总体平均

平，我们更关注增长的结构是怎么样，哪些地区或部门在增长。首先，新经济成分在高速增长，如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外资企业等经济成分保持了高增长率。例如 1998 年上半年“三资”企业及其他企业工业附加值增长 11.3%，高于全国工业附加值 7.9% 的增长率。其次，新兴行业如电子、计算机、通讯业、金融服务业等在高增长。再者，基础设施有较快的增长，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明显加快，对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发挥了主要作用。一方面，这种新经济成分或部门的增长，恰恰伴随着结构变动引起的快速增长，它会带来今后长期性的速度效应；另一方面，旧经济成分和传统产业部门增长缓慢，伴随着结构调整还会出现衰退的局面，影响全国经济增长率。从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看，调整过程中通常出现暂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这是结构调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六、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长和公平增长

长期性的速度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应带动就业增长。80 年代，我国每年平均就业增长率大约是 3%，而经济增长率达到 9%，属于“高就业的经济增长”类型；90 年代上半期，经济增长率达到 12%，而就业增长率却降到了 1.3%，属于“低就业的经济增长”类型；1997 年，经济增长率是 8.8%，而就业增长率只有 1.09%。这些数据表明，高的经济增长没有有效带动就业增长，按照这一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比例，如果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8%，就业增长率也只能是 1%。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今年能有效地把就业增长率提高到 1.25% 或 1.5%，将比实现 8% 的经济增长率更有意义。

此外，人们更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有效地实现公平增长，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现在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1997 年城镇人均消费水平增长大约只有 1.3%。这主要是因为大量职工下岗造成城市消费增长不足。所以说，解决和提高具有较大人口比重的低收入者的消费增长，将带动整个城市消费需求的扩大。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 1997 年只是 3.4%，1998 年上半年这一增长率几乎为零。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刺激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说，我们不仅关心经济增长，而且关心这种增长能否使全体人口包括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经济增长应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收入分配相对公平。

七、政府主要职责：从追求增长转向 解决民生问题

我个人认为，衡量各级政府的业绩不能只看经济增长指标。经济发展是多样化的，涵盖多种目标。政府提出经济增长率目标是必要的，老百姓关注更多的却是切身利益和需求目标。经济增长率与民生问题并不一定是必然联系的，只有政府政策能够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增长才与百姓密切相关。对于得了重病的职工来说，最关心医疗费能否报销。对于退休职工来说，最关心退休费能否按期如数领取（据劳动部统计，截至 1998 年 6 月 30 日，全国仍有 16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新拖欠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其中森工、军工、农垦等系统资金缺口较大。辽宁省被拖欠养老金职工已超过 40 万人，累计拖欠养老金

达 12.25 亿元,1998 年 1 月至 5 月拖欠 4.7 亿元)。对于下岗职工来说,是否能领取基本生活费(1996 年全国下岗职工平均每人每月领取生活费 77 元,其中黑龙江人均 27 元,内蒙古 31 元,吉林 44 元,辽宁 45 元)比经济增长率是否达到 8%更重要。养老保险改革能否推进、失业保险制度能否建立、医疗保险制度能否出台,也许比政府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更重要。如果说,这些改革措施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即使职工收入增长水平不高,也是新一届政府的历史性功绩。人民关心的是民生问题,而政府应当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政府的职责就是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八、追求目标:没有水分的有效益的 8%

实现名义上的 8% 的经济增长率比较容易,但是实现没有水分的 8% 的经济增长率是比较困难的。不能为了 8% 而 8%。如果库存增加,经济效益不断下降,企业亏损日益严重,实现这样的 8% 就没有多少意义。

我们的库存大体分为四类:其一是资本库存。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有一项是资本形成“库存增加”,1997 年为 2860 亿元,相当于 GDP 的 3.8%,而台湾地区 1995 年这一比重仅为 0.7%。其二是工业产品库存。1995 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库存额为 12049 亿元,其中产成品库存量为 4598 亿元;1997 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库存额为 14796 亿元,其中产成品库存量为 5921 亿元,分别占 GDP 的比重为 19.4% 和 7.8%。其三是商业库存。1994 年全国批发、零售、贸易业库存为 5819 亿元,1996 年上升为 7227.3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10.4%。其四是大量的能源与物资库存,如煤炭、石油、木材、

钢材、水泥等大宗物资库存。估计各类库存占 GDP 比重在 27%—30% 之间。

一般而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库存水平低，追求最小库存量，甚至有一些企业实行零库存，而在计划经济的国家，库存比例高，企业生产追求产值，而不考虑其产品能否销售出去。

因此，不是能不能实现 8% 的问题，而是实现什么样的 8% 的问题。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很容易实现 8%，但这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在当前工业制成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一味地扩大制造业生产，势必扩大库存。因此，我们希望 8% 的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效益的 8%。

（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 1998 年 7 月 29 日）

从适度从紧到积极扩大内需： 如何看待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

1994 年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高通货膨胀率，当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 21%，控制通货膨胀成为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1996 年 3 月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在“九五”期间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7 年 10 月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宏观经济政策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已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已经出现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需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1998 年 3 月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再次强调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在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提出了确保今年经济增长率 8% 的目标。他提出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扩大国内的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设施、市政设施、环保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由于我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突发性的高失业率，中央决定适时调整宏观经

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及时地提出了采取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朱镕基总理于 1998 年 8 月 2 日更加明确地指出：针对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中央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这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措施。^①

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也作出了必要的灵活的调整。从统计数据看，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 -2.1% ，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1993 年以来出现的突发性高通货膨胀率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我国政府在保证经济不受大的损害的前提下成功地抑制了高通胀率，实现了第一次“软着陆”；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突发性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直接打击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需要我们实行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的政策，实现第二次“软着陆”。通货紧缩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和过剩，也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尽管中央没有正式宣布放弃或改变“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但实际上宏观政策已经转向“适度扩张和积极扩大内需”。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年，我国仍将继续实行这一旨在积极扩大内需的政策。

二、从高通胀率到高失业率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四次完整的经济周期，相应地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也经历了周期性的变化。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反映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

^① 新华社北京 1998 年 8 月 2 日电

表”，研究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①进入 90 年代，中国也面临如何对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平衡的问题，这与我们在 80 年代仅与高通胀作斗争有较大差别。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指各类市场化指数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在反映各类要素供求关系方面的真实性不断提高。

作者估计了 90 年代的城镇真实失业率（不同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并选用了 GDP 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根据反映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奥肯模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关系的模型，首次对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了定量研究。主要结论是：（1）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高增长率还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低增长率、高失业率的情形大为不同。（2）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会带动通货膨胀率上升或滞后性上升。在 90 年代期间（指 1991—1997 年期间），当实际 GDP 增长率比增长趋势高出 1 个百分点时，通货膨胀率比上年高出 0.222 个百分点；反之，当实际 GDP 增长率低于增长趋势时，通货膨胀率也会有相应的下降。（3）在短期内（指 1993—1997 年期间），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符合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上升，但样本期稍一扩大，这一特性消失。这与美国等国类似，

^① 赫伯特·斯坦：《美国总统经济史——从罗斯福到克林顿》，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中文版。

即菲利普斯曲线只在短期内有效。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菲利普斯曲线，更不能以这一曲线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

上述三个指标之间的动态关系反映了这一时期（主要指 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两种状态：一是高增长率、高通胀率、低失业率的状态；二是高增长率、高失业率与低通胀率的状态。1992 年以后通货膨胀率快速上升，到 1994 年达到最高峰，而失业率处在较低水平；从 1993 年以后失业率由 3% 迅速上升，到 1997 年达到 7% 而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由高通胀变为通货紧缩。预计 1998 年我国城镇真实失业率达到 7%—8%，1999 年达到失业高峰，失业率为 8%—9%，失业人口为 1500 万—1800 万人，涉及城镇家庭人口达 5000 万人以上。^①

今后 2—3 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仍然是“两高一低”，即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失业率以及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三者的互动关系看，高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会降低失业率，但是高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再次引发高通胀率。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作出某种选择，并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为及时和适时调整宏观政策留下较大的余地。

三、如何理解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用来促进经济发展、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通常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外汇政策和农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有：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实现充分就业；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保持

^①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国际收支平衡。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促进农业增长，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开发人力资源，减少绝对贫困人口也是极其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稳定化政策，其目标是既要实现低通胀率，又要实现低失业率。^①从这个意义来看，宏观经济的“软着陆”是指宏观经济的稳定化，它的重要标志就是美国经济学家 Robert Gordon 所提出的“两低一高”，即低通胀率、低失业率和高人均产出增长率。仅是高增长率、低通胀率，或是高增长率、低失业率只是部分意义上的“软着陆”，只有同时达到了低通胀率、低失业率、高增长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

从 1993 年到 1997 年，我们花了 4—5 年的时间实现了第一次“软着陆”，有效地控制了高通胀率；针对迅速上升的城镇真实失业率，作者明确提出从现在起有必要再花 4—5 年时间实现第二次“软着陆”，旨在降低高失业率，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化。

决策者所面临的基本悖论或基本问题是，如何在降低高失业率的同时保持低的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高，那么降低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低真实 GDP 增长率，真实失业率就有可能升高；反之，如果决策者企图为更多的人提供工作，保持较低的真实失业率，那么，通货膨胀就会加速。这涉及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经济的短期稳定化问题；二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短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这一问题的核心涉及产出缺口的概

^① Robert J. Gordon, 1997. *Macroeconomics*, Seventh Edition, Addison-Wesley.